

宣南

清代京师士人聚居区研究

岳升阳 黄宗汉 魏泉◎ 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黄宗汉

项目主持：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馆）

北京燕山出版社

宣南

清代京师士人聚居区研究

——
岳升阳 黄宗汉 魏泉◎ 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黄宗汉
项目主持：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馆）



北京湖廣會館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宣南——清代京师士人聚居区研究 / 岳升阳, 黄宗汉, 魏泉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402-2782-1

I. ①宣… II. ①岳… ②黄… ③魏…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清代②文化史—研究—宣武区 IV. ①D691.71②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2369 号

宣南——清代京师士人聚居区研究

作 者: 岳升阳 黄宗汉 魏 泉

责任编辑: 常思薇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 100054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32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02-2782-1

定 价: 36.00 元

序

preface

假日里，我很高兴地看到了即将出版的《宣南——清代京师士人聚居区研究》书稿。这是继《宣南鸿雪图志》之后，又一论述北京宣南文化的重要著作。自上世纪后期，随着对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宣南文化作为京师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著名规划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曾著文称：“许多研究北京文化的学者认为，北京地域文化的源头在宣南，至少可以说，宣南文化是士人文化和平民文化重要的一处集中地（另一处在北京什刹海周围）。”从现存的史迹来看，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建都800年先后撰文《北京建城记》、《北京建都记》，追溯京城之源，礼赞宣南在北京城市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政府有关部门为之刻碑、立柱、建阙，在广安门外树立了两处京城的重要历史标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评价：“宣南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的精华。”并为孙中山先生五次莅临湖广会馆及在该馆参加主持国民党成立大会和纪念戊戌维新一百周年撰写了碑文，使涉及宣南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立碑为记，给后人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印迹。

黄宗汉同志是戴逸教授的得意门生，他17岁时在原宣武地区参加革命工作，后来调到市里，晚年主动要求调回他视为第二故乡的魂牵梦萦的宣南，他为宣南的文化振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结合“八七”版《红楼梦》的拍摄，创议修建大观园，就是他的杰作之一。宣南文化研究是他推动宣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实践的依据和动力，他协助历史学家王灿炽同志校勘整理了《北京湖广会馆志稿》和《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并对这两处会馆进行修复，使湖广会馆成为北京市第一个合理开发利用的会馆。鉴于他在弘扬民族文化、开发文化产业方面成绩突出，先后被北京市政府和国

务院授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为了更加深入地推动宣南文化研究，他又在古稀之年读了研究生、戴逸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研究清代宣南文化，并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后经过反复评审得到通过。这在当时是全国区县级单位唯一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课题项目，黄宗汉同志担任了课题负责人。他邀请北京大学的岳升阳博士承担课题项目中专著的主要执笔人。《宣南——清代京师士人聚居区研究》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全方位、多视角地审视宣南文化，开拓了宣南文化研究在文化地理上的新领域。

我认为继承发展“宣南文化”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研究工作必须多学科开展。多年来，各专业的学者和众多热爱宣南文化的志愿者都为宣南文化的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相继出版了一批有关宣南文化的书籍、文章、资料集等，为撰写课题专著提供了许多不可或缺的素材与思路。黄宗汉同志是历史学博士，岳升阳同志是历史地理学博士，正是通过宣南文化研究把他们连接到一起，并使他们成为忘年之交，他们之间的合作不仅在学术层面，即使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如在筹建北京建城建都纪念碑的现场，人们也能看到他们身影相随。如今黄宗汉同志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又身患晚期癌症，但是他仍然为抢救宣南文化遗产献计献策，还发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壮语，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宗汉同志托人送来书稿，征求意见，并约我为这部专著作序，我欣然从命。借此祝福黄宗汉这位热心北京文化事业的老同志早日康复，为北京宣南文化的复兴给力、给力、再给力。宣南文化的发祥地原宣武区，与原西城区合并组建成新西城区，双方优势互补，更具实力。我相信在新的西城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宣南文化的学术研究和宣南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会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定将发出更加奇异的光彩。

2011年10月

刘敬民

（刘敬民同志曾任原宣武区区长、区委书记，现任北京市副市长）

关于宣南地区的研究，在文物史迹、历史民俗、商业街区等方面几十年来已有不少成果，如关于历史建筑的研究，关于前门外商业街区的研究，关于天桥的研究，关于琉璃厂文化街的研究，关于会馆的研究，关于戊戌维新史迹的研究等等，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形成热潮，但专门研究宣南士人文化的论著还不多，如何从历史学、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当地曾经存在过的士人文化进行研究，尤其是将这种士人文化放在中国文化的大区域中加以考察，仍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一、“宣南”的概念诠释

1. “宣南”及“宣南文化”

宣南 “宣南”在清代泛指宣武门南的地区，也有的人从宣南坊的角度理解它。作为一个地域词汇在清代士人诗文中大量存在，但清人所视宣南的范围并不严格。本文所言的宣南地区系泛指清代北京外城西部及宣武门外一带区域。明代在外城建有8个坊，前门大街以西有五个坊，即正西坊、正南坊、宣南坊、宣北坊和白纸坊，宣南坊在菜市口南，范围在教子胡同至潘家河沿之间，属于南城，当时已有士人居住。清代，将北京全城分为十坊，多数坊兼辖内外城，其中宣南坊属于西城，内城部分包括阜成门街以南的地区，外城部分包括宣武门至半截胡同以西的地区。但聚居在宣外的士人们并未按照宣南坊的范围使用“宣南”，宣外

大街东边的士人也常使用“宣南”。实际上，“宣南”成为清代士人居住区的象征，深得士人感情上的认同。清代士人认同的宣南区域，大约在宣武门外。在它的北边、西边和南边有由城墙所构成的明确地貌界限，但它的东边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在这里，士人居住区在分布上逐渐为商业区所取代。《旧京琐记》云：“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士人题咏率署‘宣南’，以此也。”^① 商人多聚居于外城东部，因而“东富”；官僚士大夫多聚居于外城西部，虽俸禄不高却地位高，所以“西贵”。在外城东部虽然仍有不少士人的活动，却难以构成明显的文化景观，已不能用“宣南”来概括。本文采纳“宣南”的称呼，以便利于对该地区士人文化特征的分析。

“宣南文化” 今人在论述该地区的文化时，常使用“宣南文化”的概念。人们赋予这一概念以不同的内涵，有的用来概括本区域历史文化的总和，有的只用它来概括因清代汉族士人聚居而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②，本书借用来专指清代北京汉族士大夫的文化活动。尽管用“文化”称“宣南”，似有概念过大之嫌，但使用现成概念便于人们的理解，利于推广和应用。

“宣南文化”是京师汉族士人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由于中国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中国的士人往往既是官僚群体，又是学术的、文学的群体，一身而二任。作为仕宦的一面，宣南士人并不具有独特性，官场的风气到处皆然。作为思想文化的创造者，宣南士人则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成为京师文化的组成部分。

“宣南文化”除了以士人的文化创造为主体特征外，也包含与士人文

①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八《城厢》，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8～89页。

②王世仁主编：《宣南鸿雪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当然今人在使用“宣南”时，还考虑到北京市的行政区划，把“宣南”的地理坐标基本上划定在外城西部，以便于进行相关的研究。

化创造密切相关的如琉璃厂书市街这种特殊的文化商业，以及与士人关系密切的戏曲发展、士人会馆的组织、游览娱乐的场所等诸多从属的非主体的文化因素。

“宣南文化”在物的方面不仅包含了士人故居、别墅、活动场所、会馆、士人祠堂、碑刻、书籍用具及其他遗物、纪念物等，也包含了为其服务的行业场所。这是今天应该重视保存和发掘的方面。

士人与“宣南文化”相关联的“士人”是一个需要加以明确的概念。“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常用“士大夫”或“绅士”称呼它，它作为一个群体具有“官员”和“文人”的双重职能，表现出“一身二任”的特性^①。吴晗在论述这一群体时说：“照我的看法，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人可能具有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②

“士”字是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的一个指代名词，其含义随历史的演进而变化。关于“士”的最初含义众说不一，郭沫若认为它用以指代男子^③，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层次增多，社会组织日益复杂化，士的外延和内涵都有了变化。当一个有贵族和平民之分的阶级社会出现后，“士”的称谓被限定于贵族之中。在国家组织中，又具有了官员的含义，《诗·周颂·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孔颖达疏：“济济之众士，谓朝廷之臣也。”此时士与大夫又常常并称，《仪礼·士相见礼》：“凡自称于君，士大夫则曰臣下。”《考工记》亦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大夫为较高级的官吏，其含义与士有别，却又包含于士的范畴之中。即“大夫皆已仕，‘士’则兼容未仕者矣。公之昆

①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吴晗、费孝通等著：《皇权与绅士》，天津出版社，1988年版。

③ 郭沫若：《释祖妣》，《甲骨文字研究》，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7页。

弟，虽不仕，亦未夷为庶人，故通以‘士’概之”。士要能“任事”^①，担负起国家官员的职责，就需有“通古今，辨然否”的能力，此种技能的获得又需通过学习才能实现。因此士与“学”又发生了密切关系，成为拥有文化、教育才能的群体。由于它是一个受教育的群体，英语国家的学者在翻译它时，都注重了它的学者或知识群体的特征。如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用 literati 来指称这一集团，张仲礼则译其为 gentry（绅士），通常的译法亦有 scholar—official（学者—官员）、scholar—bureaucrat（学者—官僚）、literati and officialdom（文人—官员）等，虽然这些词都很难表达中国士人概念的确切含义，但将其同文化与教育联系在一起则是共同的特征^②。本文为方便起见，在多数情况下将使用“士人”这一简捷的提法。

当先秦的封建制度解体之后，士的外延已超出了贵族的局限，而及于庶民，其中一部分人成为职业的“文吏”，另一部分则走向经术的研习成为“学士”。汉代，学士的一类人在官僚队伍中日益重要，它与文吏融合为一个“一身二任”的士大夫阶级^③。由隋唐至明清，科举制度的日臻完备，为士大夫官僚政治的运作提供了保障，士大夫成为文职官员的核心，构成一个具有特色的阶层。这个阶层将儒家的伦理教化用之于维护统治秩序，并善于从前代汲取统治的经验，它对于维系庞大帝国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也为自己的群体创造出注重诗、书技能的文化氛围，其中一部分人还成为学者型的人物，创造出灿烂的文化。本书采用“士大夫”或“士人”的称呼，不采用“绅士”或“缙绅”的提法。

士人群体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结构，尤其到明清两代，士人群体发展

①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卷三。

②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③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到它的顶峰，其群体的内部结构更具有多层次、多类型的特征。张仲礼将中国绅士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绅士多是由科举步入仕途之人，包括进士、举人、贡生及由此一途而成为官吏的人。下层绅士是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捐生以及其他一些有较低功名的人。他利用清代婚丧礼仪规定中的差别，将七品和七品以上的官员，以及进士、举人等，划归上层绅士，将八品和八品以下的官员，以及生员、监生和例贡生等，划归下层绅士。上下两层绅士有着不同的特权和职责。在这套结构中还包括武举的部分，但武举一途，在文化程度上一般较文举为低，与本文所研究的士人群体有所区别，故不在本文考察之列。据张仲礼的研究，19世纪前期的绅士阶层有110万人，只有12万即11%属于上层绅士，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绅士阶层有145万人，其中近20万属于上层绅士，在绅士中所占比例增至14%^①。

许多清代士人含有官僚和学人的双重身份，在许多人身上二者是分离的，在另一些人那里二者又集于一身，具有学人官僚或官僚学人的特性。还有一种是处于学人与官僚之间的幕僚，这些人又有学人与非学人之分。他们中有的只是从事事务性的工作，有的则主要从事编辑书籍或学术研究的工作。作为官僚的方面，虽是士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受到官僚制度的强迫制约，更多地表现为上下层之间的差异，地域空间上的差异并不突出，难以体现出文化上的个性与创造性，不便于进行比较研究。而作为学人的一面，则是宣南士人的精华，其在这方面的创造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鲜明特征和丰富内容。因此，本文将官僚面的内容尽量简化，而将更多的研究空间留给其作为学人的一面，对今天来说，它是更有价值的方面。

关于“学人”，本文借用尚小明《清代学人的幕府生涯及学术活动》

^①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一文中关于“学人”的概念^①，称呼士人中从事学术著述的人，以及一些在文学方面有创造的人。但本文对学人不作广义的解释，对于那些一般性地吟诗作文以自娱者，那些仅仅从事绘画、书法、篆刻的艺人都列入学人之列。这样分类是为了便于对士人作深入分析。

在许多清代学人眼中，文人是那些卖弄诗文而不事学术研究的人，常有贬义隐含其中，而那些单纯从事书画篆刻的人也不被士人视为同伍，对于这些在文化特征上不同的人，应在研究加以区别。

2. “宣南文化”与清代京师文化的关系

京师文化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中，京师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京师指国都，《诗·大雅·公刘》有“京师之野”，“京”是向阳的大块高地，“师”为军队驻扎地，后称国都为“京”或京师。又由于中国古代常采用多京制，因而后来只将皇帝所在的都城称为“京师”。明代实行两京制度，中央政权所在的都城称为京师，陪都只设“行在”。明永乐皇帝建都北京后，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行在。清朝定都北京，仍以北京为京师。为区别起见，我们将历史上的首都文化称为京师文化。

京师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这种中心的地位是中国古代都城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由国家的组织形式所决定的，它是京师文化的基本特征。京师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具有较强的会聚性和辐射性，它在全国各地的文化交往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京师文化在学术文化方面表现为文化活动与中央政治的紧密结合，京师为学术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可以登高而呼、影响四方的高台。在京师之地，中央政权的影响作用浸透于社会的各

^①尚小明：《清代学人的幕府生涯及学术活动》，第8页：“这里先对‘学人’一词做点解释。顾名思义，‘学人’即学者与文人。在清代，长期以来，理学高居庙堂，但汉学最为兴盛，其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经学、史学、诸子学、小学、金石学、校勘目录学、历算学、地理学等，晚清又有西学大规模输入。凡在以上领域作出贡献，或有一定地位与影响者，均可以视为学者。同样，挥毫泼墨、吟诗作画为中国古代文人性格的重要方面，故凡是在诗文、绘画、书法、篆刻等领域作出贡献或有一定地位与影响者，均可以视为文人。”

个层面，而对于官员与学人一身二任的士大夫来说，影响尤为强烈，这是京师与地方上显著不同的方面。它不但会影响寓居京师的士人，也会经过士人影响于全国。

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已历数百年之久，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京师文化，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其中对于今天影响最大的则是清代以来奠定的文化形态，直到今天仍能感受到它的身影。

士人文化是清代京师文化的组成部分 北京清代京师文化大约可以归纳为几个大的层面，每一大层面又可分为多个子层面。第一个大层面是政治文化层面，包括多个子层面：有处于社会上层的皇家和贵族的文化层面，具有特殊身份的一般旗人文化层面，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层面等，它们构成清代京师文化的重要方面，甚至是主要方面。其中涉及到中央权力的方面，涉及到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结合的方面，这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是区别北京与其他地区不同点的重要之处。第二个大层面是经济的层面，包括商业、手工业、服务业和娱乐业等的文化层面。第三个大层面是市井平民文化层面。第四个大层面是宗教信仰文化层面。第五个大层面是城市建筑文化层面。当然在这中间还可以有许多细分，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但北京清代京师文化的多层次性却是十分明显的，同其他地区相比形成鲜明的特色。

京师汉族士人的文化 “宣南文化”是清代京师汉族士人的文化，汉族士人在身份上与满洲贵族之间存在着地位低下的不对称差异，这使京师的士人文化有了复杂性，对士人的心理也有着潜在的影响。但汉族士人仍在清朝政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京师保持有庞大的群体，他们的思想文化对满清统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受到朝廷政治和文化的影 响，与满清统治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互动关系，是多重关系中的汉族士人文化。士人的行为中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此处的士人文化强调的是积极的一面。

京师文化决定了“宣南文化”的特征 京师文化的会聚性和辐射性，

对于全国的枢纽作用，以及同中央政权之间的密切联系，使京师士人可以借助中央官吏的地位和中央政权的领导职能发挥在其他地方难以发挥的作用。京师文化的特殊性使“宣南文化”的概念超出了狭小的地域范围，使其在全国文化中占有了重要地位，成为今天清代学术文化研究中不可忽略的方面。

二、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本书试图通过对宣南这个具体地区的研究，探讨清代士人在京师文化空间中的文化运作，考察士人文化与京师文化的关系，论述京师士人文化与其他区域士人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研究京师文化在清代文化史中的作用。当然，它不是从纯粹政治史、思想史的角度进行考察，而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其空间上的结构与互动关系，是历史地理学在文化关系上的探索。为此我们将扣住清代宣南士人文化的问题展开研究，在宣南的士人文化中，最有意义的，是士人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造方面达到很高的程度，人员和著述的数量都大大超过前代。而这些士人多曾在宣南活动，他们的大量学术或文学的创造是在宣南实现的。这就使我们有必要给予认真的探讨，研究他们在此的活动特性，他们所保持的地缘关系，特别是京师文化及宣南的人文环境对他们的文化创造产生了哪些影响。同时，也探讨宣南士人文化形成的原因及其衰落的过程。

对于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城市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时，不能忽视其历史文化的存在，像北京这样的历史都城，留给现代城市的遗产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物化的景观，如建筑、道路、园林、整个城市的布局、天际线和基本色调，以及民俗的遗迹等，它们构成丰富多彩的呈现于后人眼前的有形景观。另一个是非物化的景观，它是历史时期该地居住者的精神生活、文化素养和创作活动等，它存在人们的记忆、传说和文字记载之中。它可在今人的心中构成历史的景观图像，同有形的景观一起，形成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而对今天的城市文化建设产生影响。宣南士人文化

的精华部分正是这后一种文化景观的突出代表,然而它也是以往最被人忽视的部分。因而,在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中,需给予更多的关注,成为城市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区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90年代以来,区域文化的研究更结出累累果实。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时间与空间结合的角度重新审视各自的领域,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地域分析方法和前人的分析成果,形成愈加丰富多彩的景象。但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在中国传统地域观念强大惯性的牵引下,不知不觉地忽视了某些客观的地理区域坐标,以致难以对地域间的文化关系作出更深入的分析。这一缺憾在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区域的概念中往往缺乏地理的坐标。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是在巨大地理空间中形成的统一文化,是一个大地域文明^①,它的特征之一是对地理差异的重视。早在汉代,司马迁就曾论述过全国的地理区划^②,明清时期由于南方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文化的优势十分明显,在士人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南北文化观,以致影响于政治和学术,南北之别成为重要的文化地理观念之一。但这还不是最基本的文化地理观念,士人所持的最基本的文化地理观念是建立在以血缘为纽带和以宗族社会为基础的地域认同之上的,体现着士人群体的地缘关系,这在士人们论述学术演变和文学流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清代士人们在论述学术演变和文学流变时,多是以祖籍地为坐标来构想学人的特性和学派的分野,而忽视客居地的影响。在学派划分上,许多学派都以地域名称相标示,如学术上有“浙东之学”、“浙西之学”^③,文学有浙派诗学、桐城古文等等,学派营垒的划分多以其代表人物的籍贯为依据,即便该人的学术特征形成于他乡,大部分创作在他乡完成,也仍以籍

①唐晓峰:《中国古代文明是大地域文明》,唐晓峰、李零主编:《九州》第一册,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③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内编二。

贯为归类依据。对于那些不以地域名称为名的学派，人们在分析时也习惯由籍贯地入手，来说明其派别归属。这种分析方法不但体现在后人对前人的分析中，也表现于对同时代人的看法上，成为派别分野的重要标志。这一特点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其合理的成分占着主导的方面，甚至是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入手之点。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学术发展中的地域因素，学术的发展依赖于师承关系，而师生关系又多以地域为依托，是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存在的，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代学术演变的渊源关系。在中国这个重视纵向传承演变关系的文化环境中，这种分析方法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形成强大的惯性，一直影响至今。在今天的许多地域文化研究中，都可以看到依据籍贯进行的种种统计和分析。不过，这个传统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会使人忽视许多地域间的文化交流关系，尤其是忽视京师文化环境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以及京师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这些正是我们在分析宣南士人文化时所必需面对的问题。

有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对宣南士人文化进行分析时，尤其是在分析士人的学术变化时，将当时人有关学术流变的地理“构想”与实际的地理空间加以区别，对传统的地理观念作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在保留其合理因素之外，跳出籍贯视角对学术研究的约束，给予客观的地域以应有的关注，以便于对京师文化的研究，并探讨其对于学术的影响。当我们从京师文化的角度审视学术与文学的发展时，就会发现一些著名学人的学术道路正是在京师奠定的，他们中有的人在京师学人浓重的学术气氛中改变了自己的求学道路，由重诗文转而重学术；有的因得到名家指点而迅速进步；有的利用官场上得来的名声而张扬了自己的学术；也有的怀着显赫名声来到京师，不但给京师学术带来生气，同时也使其自身的影响更为扩大。而其家乡士人的望风景从，又促进了地域学术特色的形成。同时，京师的地位也使学人有如登高而呼，增强了学术思想的传播能力。当我们注意到京师文化环境的上述作用，就更易于认识地域文化间的互动关系，了解地域的真

实文化特征。

清代京师的汉族士人并不仅仅分布在宣南地区，他们来到京师不一定都住在宣南地区，有的人住在外城西部，有的人甚至住在内城。清代虽禁止非旗人的“民”居住于内城，但例外的情况是很多的，如一些为王公贵族服务的士人，或王公贵族的挚友都有可能被允许住在府内，某些皇帝的近臣也常被赐住内城。而且士人在京的住所是常常变动的，有时同一位士人，最初可能住于宣南，以后又被赐予住在内城，或者在内外城之间不断变动。但即便有这些不确定因素，作为进京汉族士人的整体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必然是住在宣南，或至少曾经住过宣南地区。尤其是那些进京赶考的举人，主要住在宣南。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分析宣南士人的地域来源时，可以粗略地用分析全体在京汉族士人的指标来分析宣南士人，以便求出一个近似的结果。

也是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在研究清代京师汉族士人的文化区域特性时，需要超越宣南的地域界限，将其放在整个京师的地域空间中加以考察，方可把握其内在特征。可以说，“没有一个普适的（区域）划分方法能对所有的现象都同样合理”^①。尤其是人文现象的地域分布，其边界往往是模糊的，即便在城市的街区中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涉及士人的学术与文学等精神文化的创造时，我们已无法局限于宣南或外城，因为它已同整个京师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在许多时候是作为京师文化特征的组成部分出现的。

为了对宣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我们绘制了相应的地图，希望能给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便利，同时便于读者对本项研究的理解。

^①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评述》，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4页。

目录

contents

序	1
导言	1

CHAPTER 第一章 北京“宣南”区域的形成 1

第一节 城市区域的出现与早期变迁	3
一、宣南为北京城肇始之地	3
二、宣南为北京始建都地	6
三、元大都的兴建与南北二城格局的形成	8
四、大都南城的衰落	12
第二节 明代城南关厢的发展与外城的兴建	15
一、明初北京的城市改造	15
二、南城的废弃与关厢的形成	19
1. 南城的废弃	19
2. 城南关厢的形成与发展	21
三、北京的外城建设	22
四、明代内、外城的商业布局	24

CHAPTER 第二章 清代旗、民分置与宣南士人聚居区的形成 31

第一节 旗、民分置对城市结构的影响	33
一、清初旗、民分治政策的确立	33
二、城市商业、娱乐中心的外移	35